

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4 年度)

项 目 类 别 自筹项目

立 项 编 号 BZ24ZC086

学 科 分 类 政治学

课 题 名 称 “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巴中为例

项 目 负 责 人 鲁成

项 目 参 与 人 鲁朝英、陈洁梅、李秋思、汤海生

负责人所在单位 四川文理学院

联 系 电 话 15023350955

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制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巴中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一、研究背景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于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提出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是一项顺应民心、惠及民生、赢得民心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讨论稿）》。会议强调，要借鉴“千万工程”中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将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主要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2024年3月19日，巴中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举行，市委书记鲜荣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借鉴“千万工程”经验，重新审视乡村价值和发展潜力，深入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投资市场、要素市场的潜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充满活力、留住乡愁的美好家园。“千万工程”实施20年多来，在保护农村居住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果，创造了许多美丽乡村，造福了广大农民，也为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具体措施。本课题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巴中乡村治理现代化，聚焦巴中市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以持续改善乡村面貌为重要突破口，巩固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打造出一份巴中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样本”，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宝贵的经验。

二、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术界从不同层面对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钱建超（2024）提出要深化学习、借鉴应用浙江实施“千万工程”经验做法，发挥平畴沃野比较优势，用好区委党校和美乡村学校平台，紧扣“两确保、三提升、两强化”，深入实施“四千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特色高效、人才集聚兴旺、民风向上向善、生态优美宜居、组织坚强有力的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区，在重庆市率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庆实践、谱写农业强国建设重庆篇章作出贡献。谭功胜（2024）指出统筹布局乡村“三生”空间，着力构建“区、镇、村、院、户”示范创建“五级联动”机制，整合各类资源，激励群众参与，加快创建十个样板镇、百个和美乡村、千个和美院落、万个示范农户，连点成线、连线成片，持续提升乡村品质品味，加快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具有梁平辨识度的巴渝村景。黄

祖辉和傅琳琳（2021）在阐释浙江“千万工程”实践及其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浙江“千万工程”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启示，即在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治理中，应探索建立“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也就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以及“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以充分发挥不同制度对行为主体在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和营运管护中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胡永芳等（2019）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角度分析“千万工程”的成效与特点。胡豹等（2023）通过系统分析浙江省“千万工程”20年的示范引领、整体推进、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升级版、千村3A万村1A、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等6个阶段的演变迭代，概述了“三大革命”全域推进、“大花园”全域打造、美丽经济发展、人文乡愁传承等的建设成就，总结了人本发展、绿色价值、系统治理、经营村庄、政府引导等建设经验等。

关于乡村治理有关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思考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苏弘骥、傅慧芳（2024）认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动力源，以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为价值追求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重构乡村治理的“双向轨道”，推动乡村治理向信息化、智能化和高效化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陈然（2024）提出要坚持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以“乡规民约”为逻辑的契约化治理，构建以德治为支撑的自治法治乡村治理体系，以“枫桥经验”为内核，结合地方特色，构建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郭险峰、郭堂辉（2024）认为发

展乡村产业，激励农民积极投身经济实践，以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场域耦合要求，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动力。同时，要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通过规范化、机制化运行，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水平。

三、浙江“千万工程”的主要做法

浙江“千万工程”创造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模式与典型案例，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为乡村全面振兴，全体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保障。

（一）坚持党建引领、党政主导

“千万工程”之所以能在浙江取得显著成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坚持了党建引领、党政主导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也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坚持党建引领和党政主导是确保乡村治理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得显著成效的核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乡村治理工作有序进行，同时充分发挥了各方的力量，共同推动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明确要求，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必须承担起“千万工程”的领导责任，并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浙江在实施“千万工程”过程中，将加强领导作为关键，明确了各级党委和政府乡村治理中的职责，以保证政令畅通、执行力强。通过建立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逐级负责、层层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确保每项工作都

有专人负责并落实到位。此外，引导政府部门转变职能，更注重服务而非单纯的管理，以提高为民服务的水平。同时，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把乡村治理成效纳入干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并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定期对乡村治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巴中地区可以在坚持党建引领、党政主导的原则下，有效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农村整体发展水平，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了实现乡村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目标，必须加强向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推动资源的节约使用、环境的友好相处以及低碳循环的生产模式，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这种绿色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为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带来新机遇，而且能促进高效、绿色和低碳的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有效减轻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了推动乡村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提出要将村庄整治与绿色生态家园建设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打好“生态牌”，坚定树立并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建设美丽中国置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优先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的明显改善，使美丽中国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加快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现代化。浙江在实施

“千万工程”的全过程和各个阶段中，贯彻这些重要理念和要求，以解决环境“脏乱差”问题作为突破口，全面推动农村环境的“三大革命”，全力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开展“无废乡村”的建设，实施生态修复，不断强化生态的基础。巴中通过学习并应用“千万工程”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不仅有效解决了当地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案例。

（三）坚持以人为本、共建共享

坚持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的原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一理念着重于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人民的需求和福祉，确保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发展的过程并从中受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强调，必须将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尊重农民的意愿，并调动农村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浙江实施“千万工程”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人民至上、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扎根人民的原则，并将其贯彻到各项决策与实际工作中。工程从最初就着眼于提升人民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在发展过程中，重视民生保障、改善民生，不断确保、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有效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浙江“千万工程”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

战略规划、深切关怀和指导，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必须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重要性，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并切实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学习其应用，掌握其中蕴含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策略、方法和具体成效。

四、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巴中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量相对较弱

“千万工程”在治理实践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强化党建引领，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确保党的组织坚不可摧。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石，维系着基层稳定，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也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巴中一些地区基层党组织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不足。调研发现，巴中部分村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滞后，受到传统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的限制，缺乏创新意识和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无法有效应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

要求。一旦遇到乡村集体利益冲突，他们难以采取恰当的策略，无法及时客观地解决各种矛盾。此外，党员干部的再组织化能力较弱，无法建立起一个更开放、包容、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无法积极参与村务治理，共同推动乡村的发展进步，导致组织活力下降、工作效率降低。二是乡村党组织的人才队伍建设不力。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关键。以巴中部分村为例，一方面，农村基层后备人才短缺，村级后备干部源头活水不足、人才流失较快，人才“引不来”“留不住”，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制约，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另一方面，乡村党员队伍年龄学历结构不合理。许多农村青壮年和高学历人才选择到城市工作或生活，发展年轻党员困难，无法为党组织补充新鲜血液，导致乡村党员队伍老龄化严重，60 岁以上的老年党员占比最大；相反，年轻党员队伍数量不多，使得整个党员队伍的平均年龄偏高，文化层次差异较大，思想素质较差。根据 H 和 Y 村统计的数据，党员总数 130 人，60 岁以上的占 70%，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10%，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90%。由此可见，低学历党员比例严重偏高。

（二）多元主体社会治理能力仍待提高

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千万工程”是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系统治理、系统谋划、系统思维。然而，在调研中发现，在数智乡村的建设过程中，巴中地区仍然受到传

统治理念的束缚，多元主体的服务能力严重不足，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瓶颈。一是村两委干部的智能化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智能化和数字化成为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但一些村干部的思想观念仍然较为落后，缺乏学习和创新意识，难以适应农村快速发展的新需求，也无法提出有效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策略。他们在面对乡村治理现代化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存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问题，习惯于当“太平官”、“懒散官”。此外，还有一些村干部缺乏经济头脑、科技知识和市场意识，对于如何有效推动本村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没有明确的思路和主见，也没有结合当地实际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和近期工作方向，导致工作停留在“纸面”上，特别是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方面，显得能力不足，魄力不够。二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文化素质需要提高。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增强村民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和支持，还能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农民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建设主体。城市地区通常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对于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可能缺乏这些资源，加之农民自身文化水平低，接受再教育的意识较弱，导致村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这影响了村民的教育质量和文化素质的提升。在乡村治理过程

中，部分农民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缺乏科学认知，缺乏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对乡村治理现代化抱有质疑态度，从而给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调研发现，一些村民误读国家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不高，对治理现代化的思路不清晰，方向不明确，措施不得力，缺少专业的发展意识，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制约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三）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深度有待提高

“千万工程”顺应时势统筹实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缩小城乡差距的主抓手和突破口，推动“城市反哺农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一是城乡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长期以来，城乡产业发展分离、对立的特殊表现，导致城乡之间主导产业存在一定差异，产业融合深度不足，经济和产业结构的重点不同，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互补和融合。在城市，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占主导地位，拥有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能够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吸引大量人才聚集。相比之下，农村则以传统农业为主，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和一些初级加工业，这些行业附加值相对较低而风险相对较高，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足。二是城乡产业链不完善。城乡产业链条的构建和优化对于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至关重要，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许多农村地区由于缺乏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农业与工业发展仍然存在农业

全产业链不完整，城乡工农产业发展失衡，城乡产业集约化发展水平低，使得乡村特色产业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集聚效应，限制了其发展潜力。

三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差距。加强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根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制约了城乡融合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足，致使城乡产业融合层次低，整体竞争力不高，成为乡村振兴的薄弱环节，制约了巴中乡村产业发展、城乡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四）乡村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数量短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加快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许多技能娴熟的年轻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寻求更佳就业机会。这导致乡村人才储备不足、素质整体偏低、发展活力有限。在对巴中地区部分村庄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乡村普遍遭遇人才短缺、结构失衡、素质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一大挑战。要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农业强国，迫切需要一群热爱农业、精通技术、擅长经营的综合性人才。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29562 万人，比 2021 年增加 311 万人，增长率 1.1%。其中，本地农民工 12372 万人，比上年增加 293 万人，增长 2.4%；外出农民工 17190 万人，比上年增加 18 万人，增长 0.1%。全部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40.8 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6

岁，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7.8%。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乡村正面临本土人才外流严重、缺乏高技能农业人才的问题。通过对巴中部分乡村调研得知，大量人口外流，留在农村的基本上是“留守老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导致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农村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和城市群集中流动，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丰富劳动力，也提升了农村家庭收入，对城市建设和工业进步贡献巨大。对巴中部分乡村调研发现，人口大量到城市发展，导致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失血”和“贫血”，乡村社会治理遭遇人才短缺的困境。诸如“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村落空心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人才总量不足，乡村衰落问题愈发突出，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五、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巴中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党建引领起着关键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我国党建工作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线阵地。巴中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市，农村面积广阔，常住人口众多，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同时面临着城乡和区域差距的问题。因此，提升“三农”工作的现代化水平、推进乡村治理任务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必须遵循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构建党建网格，完善基层组织体系，

不断优化乡村治理机制。一是要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必须有一个过硬的党员队伍。”因此，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将其打造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加强村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培训，提升他们的思想觉悟、专业素质和管理水平，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化村干部队伍，确保能够有效引领乡村治理。此外，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参加关于党的最新理论、国家政策法规、农村工作实务等方面的专题培训，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提升村干部在复杂形势下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能力，使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农民群众，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质量，还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同时，鼓励基层党组织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如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运行，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考核。

二是要加强乡村党组织的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的数量和质量。“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支部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只有

拥有觉悟高、干劲足、能力强、有群众基础和奉献精神的村党组织带头人，才能搞好乡村治理，发展好村级经济。因此，我们需要选拔和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年轻干部充实到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提升整体队伍的活力，打破干部队伍的瓶颈，夯实乡村治理的人才基础，从而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二）推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

“千万工程”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实践范例，是顺民意、惠民生、得民心的德政工程、幸福工程。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独角戏”，而是“协奏曲”，需要从多层面协同推进，其政府、村民和社会组织的“双向奔赴”，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引领，打造“多元共治”的理念，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内核动力。一是激发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将自治、法治、德治等传统治理要素结合，让他们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各项活动中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农民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农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直接影响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和效果。因此，提高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提升农民的参与度和自治能力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有助于增强乡村地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乡村自治和自我管理。

二是乡镇政府应发挥其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有效的政府引导，可以促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应促进政府行政与农民管理的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需重视“三农”工作，确保责任到人，并不断提升工作水平，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政策部署落地。同时，要加强监管涉农资金项目，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厉打击任何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三是应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通过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创造条件让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共同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的导向和重点，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土地等资源支持。同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会议或研讨会，共享信息资源，增强相互理解与合作。

（三）加快促进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产业融合是巴中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伴随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应以城乡产业融合为抓手，强化产业兴旺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巴中乡村地区的“造血”能力，形成城乡“产业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增强城乡经济联系和互动。一是推动城市要素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实现城乡产业深度融合。遵循“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融合”为基本原则，打破城市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乡村传统农业之间的失衡和断层现象。鼓励和支持把乡村产业纳入城乡产业体系中，推动城

市产业延伸到乡村产业中去，乡村产业拓展到城市产业中来，实现城乡产业的良性互动和双向发展。应把城市现代信息技术引入乡村农业生产过程中，提升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进而加快推动乡村产业升级，提高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强化城乡融合发展的产业链韧性，构建纵横向融合的城乡一体化产业链条。坚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着力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加强农村产业结构与城市产业链之间相互促进、有机衔接，形成一个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同时，推动巴中城乡产业链上下游的集群式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进而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此外，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应当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使农村与城市产业链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转型和再造，提升整个产业链系统的灵活性和智能化水平，并促进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三是加强城乡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机制和政策体系，精准补齐城乡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巴中城乡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使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而缩小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差距。基础设施是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亟待加强的一个环节。政府应以政策为媒介，增加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强乡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赋能农业生产智能化、乡村治理智慧

化，弥补农村基础设施的不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支撑。

（四）培育壮大乡村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数量

在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的基础上，如何推进巴中乡村治理、实施具体措施以及确定工作重点成为关键议题。基层治理的核心主体是人民，而人才是治理成功的关键。因此，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达成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首要任务。为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并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以新技术和新模式催生乡村新产业和新业态。习近平强调，“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一要通过“筑巢引凤”方式吸引更多外来人才下沉乡村，增强乡村治理的发展动力。为此，地方政府需要出台优惠政策和奖励机制，鼓励优秀大学生、退伍军人、本土青壮年和专业技术人员返乡发展，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除了优厚的待遇，还需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设置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与此同时，通过邀请各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引进人才开展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将他们培育成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从而为农村发展提供智力和人力支撑。

二要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价值引领。一方面，巴中作为川陕苏区的核心区域和首府所在地，是红四方面军最早解放的区域，要统筹提升乡村产业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提供税收减免、贷款免息、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挖掘并培育出更多有活力和有竞争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培育本土人才，让更多本土人才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规模和数量。要积极引导小农户、市场主体、农民工加入，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为乡村全面振兴和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同时要聚焦真心爱才、悉心育才、精心用才，培养“永远带不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队伍，为巴中乡村治理提供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枫.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打造“最江南”鱼米水乡[J].江苏农村经济,2024,(08):43-45.

[2]孙建红.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基于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经验与启示[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4,37(04):27-32.

[3]张艳.以文化建设助力“百千万工程”协同区域协调发展[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03):110-112.

[4]刘江林.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以湖北省咸丰县为例[J].党政干部论坛,2024,(06):45-47.

[5]罗建章,周立.强人强村:选优配强促进强村富民的实践逻辑——来自浙江“千万工程”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案例分析[J/OL].中国农村经济,2024,(06):94-116[2024-08-23].

[6]宗成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实践探索——以陕西商洛市为例[J].国家治理,2024,(11):61-66.

[7]兰连你尔.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调研思考[J].当代县域经济,2024,(06):64-65.

[8]周立,赵月枝,贺照田,等.“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23)[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03):1-31.